

协同治理助力职业教育的“三维变革”理论渊源与路径优化

吴昌林 张泽政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协同治理视角下,发展职业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新的逻辑内涵,二者的结合客观上延伸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场域,也折射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职业教育层面的缩影。当前,职业教育在教师队伍稳步提质、办学模式创新优化、构建动态评估的反馈机制等方面存在现实困境。职业教育应立足协同治理与“三维变革”的实践要求,采取如下措施:整合多元协同主体,夯实质量变革的物质基础;打造数字协同模式,探索效率变革的协作方法;强化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动力变革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92(2023)05-0065-09

DOI:10.13972/j.cnki.cn21-1500/g4.2023.05.005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1]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对于稳定教育全局、助推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阐释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以下简称“三维变革”)的内涵、来源、依据等内容的基础上,以协同治理为切入点,系统分析现阶段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逻辑定位、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本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协同治理的应用场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理论框架。

关于职业教育的“三维变革”,学界已有相

关研究。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此类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例如,张太宇、王燕红从职业教育对需求端的适应性出发,认为课程思政创新发展能形成职业教育功能拓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2];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从凝聚教育合力的角度指出,校企合作等形式可形成助推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效益变革^[3];赵降英立足于人才培养,认为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转型的必然^[4];张海明等论证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是实现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路径^[5];周文和、尤伟从职业教育的转型方向入手,认为它需要具备双重的社会功能定位^[6]。

从现有成果来看,学界鲜有将协同治理应用于职业教育的“三维变革”研究。但是,学界

收稿日期:2023-08-16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GL51D)

作者简介:吴昌林,男,江苏南京人,华东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通信作者:张泽政,男,江西赣州人,华东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协同与社会治理研究。

普遍认同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靠职业院校。具体而言,办好职业教育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7],职业教育质量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方力量协同^[8],而高等职业教育要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三方组织或个人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等论断^[9]也验证了这一点。从学理与实践价值的角度看,协同治理在发挥多主体功能、提高协作效率和促成机制变革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助于破解职业教育在“三维变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二、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学理内涵与实践依据

科学把握职业教育的“三维变革”,是探索职业教育本质及其优化路径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则很难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优化策略。就学理与实践而言,“三维变革”具体表现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蕴含着较强的理论与实际指导价值。

(一)学理内涵

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兼具定性和定量的含义,需要在特定主体的参与下,通过有效的协作模式进行统筹分析和优化提升。从治理的视角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化逻辑可分为质量生成、质量变革和质量治理三个层次,由此构成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核心^[10]。

从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外在形式看,它包括学生的就业质量与教学质量,需要综合各类潜在要素,从学生接受度、课程设置、就业质量等维度,全面探索质量变革的方法路径。简言之,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多重手段及各类要素的融合,实现职业教育的质的提升。

职业教育的效率变革侧重于从教育的全局入手,从教育模式的优化创新着手,提升职业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它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同时要以全面的眼光统筹兼顾。“不论外延发展还是内涵发展都必须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重视高等职业道德教育发展过程与结果,必须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的‘适应’这个核心问题。”^{[11]37}效率提升最终要以市场为检验准绳,无论是模式创新还是教

学手段的更迭,都不能脱离这一前提。效率变革要适应市场的这一客观要求,指明了职业教育效率变革的方向。这就要求从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重视角出发进行考量,创新优化职业教育的教学、办学模式,提升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职业教育的动力变革则侧重于变革的驱动源,包括推动职业教育理念、模式和体制实现创新与变革的各类因素。过去,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自职业教育内部;现在,职业教育发展必须从内部驱动转到外部驱动^[12]。这一变革视角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具有可取之处,而为进一步助推职业教育深化变革,需要引入外力增强其变革的决心和可行性。驱动变革的力量是职业教育动力变革的基础,要求从机制层面提供保障,确保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构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看,职业教育应具有朝着公平与普惠两大方向变革的动力。这既是衡量职业教育升级迭代的重要参照指标,也是国民教育向纵深发展的价值遵循。

(二)实践依据

从政策层面看,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强调,要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相结合、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体系^[13]。为加快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企行校协同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机制,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在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指导意见^[14]。相关政策的颁布与实践鲜明地体现出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理念,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遵循和实践指南。

从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看,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其特殊要求,须认清新时代职业教育质量生成、质量变革和质量治理的“三大逻辑”转向^[15]。这是建成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实践方向,体现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指导价值。而要使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职业教育要从制度变革、效率变革

和动力变革入手,融合多方资源^[16]。相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均指向了协同治理的理论范畴,要求立足于职业教育本身,通过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促成职业教育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以适应我国现行的经济形势和教育生态。

三、协同治理深化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逻辑定位

立足新时代,职业教育应接受高质量发展这一标准的检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需要在逻辑定位上重新审视。协同治理理论的协同主体、协同模式、协同机制与“三维变革”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对职业教育的逻辑定位具有正向的校准作用。

(一)协同主体:质量变革的物质基础

多元的协同主体是推动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基础。基于此,要推动职业教育的有序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学校或教育管理部门,必须将社会组织、家庭、资本等可形成多元支撑体系的主体与学校有机结合,通过多主体的参与形成物质合力、精神合力,以各主体的平等地位作为核心内容,确保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共生局面^[17]。如果脱离了多主体的支撑,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将难以按既定目标有序开展。

从职业院校的创新发展看,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专业的管理团队、雄厚的社会资本、宽松有序的管理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实现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提升、人员稳定、软硬件设施升级、公平有序竞争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各类要素要在实践中完备,必须历经复杂的规划设计和治理程序,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细分主体的支撑。从质量变革中的教学质量这一特殊的维度看,质量变革不仅是多主体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多主体间交互协同,能够在共识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步调的相对一致性。这就需要教师、社会组织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深度沟通,而此类共治模式将成为职业教育适应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8]。

(二)协同模式:效率变革的实践指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创新协同模式,通过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提高职业教育的资金使用效率、教学管理效率和资本有序参与效率。现代职业教育已

有相对成熟的办学经验和方法。例如,校企双方共同拥有产业学院的产权,是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建设模式相似的职业教育模式^[19]。目前,与之类似的模式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职业院校,并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产生了深度融合。

显然,职业教育仅凭单一的办学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势必要在实践环节不断创新迭代,从而准确了解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以获得效率提升的初步成果。职业教育要构建高效的运转模式,必须联结市场的需求端和供给端以抹平信息偏差,进而打通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就业通道。因此,职业院校应借助市场反馈及与用人单位的密切互动,灵活调整培养方向,充分适应生产领域的特殊需求,避免出现资源浪费和配置低下等现实问题。此外,效率变革更加关注模式创新,要求通过有效的协同模式使效率产生质的飞跃。实践表明,以创新驱动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生产领域与职业教育领域技术知识双向互动的结果^[20]。而且,这一互动关系会伴随着职业教育的纵深发展而更加紧密。

(三)协同机制:动力变革的长效保障

职业教育的变革动力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其效能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21]。从内部因素分析,变革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内而外的机制变革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动力之一;从外部因素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进步创造了大量的岗位与人才需求,职业教育为填补各业态类的技术型人才缺口提供了智力支撑,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如何激发职业教育变革的长效动力及助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向来是学术界和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关注话题。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看,这是一项系统化的民生工程与教育工程。职业院校作为第一载体,其发展程度和走向,对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协同机制的构建,则为职业教育的动力变革及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说,构建职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是职业教育动力变革的重要基础。此外,从动力变革的条件

看,需要有合理、稳定的机制作为后盾,借助机制革新有效规范各主体的行为,构建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催生职业教育的动力变革。从动力变革的发挥看,合理的运行机制打造了一套严密的协同框架,能够将职业教育各子系统的功能有序凝结起来,进而发挥整个系统的最大效能。

四、深化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现实挑战

在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都占据着特殊的战略地位。从其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实践进程看,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教师队伍稳步提质的困境、办学模式创新优化的阻力、动态评估的反馈机制滞后等挑战。以上各类制约性因素既是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障碍,也是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一)教师队伍稳步提质的困境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专业教师团队稳定性不足、自我认同感较低等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师资队伍的稳定提质和特色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显著障碍。教师队伍存在的现实问题既受教师群体的心理因素影响,也与社会观念、职业院校的管理等因素有关。

受制于群众的认识偏差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存在着显著差异,特别是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师资建设和招生就业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22]。对于学生而言,职业院校往往不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更多是无奈之后的妥协。尽管当前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较之于以往有了显著提升,但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仍然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对岗位的认同感、价值感不高,给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忠诚度埋下了隐患。此外,虽然各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历经迭代,师资水平已有了阶段性的提升,但职业教育仍然存在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产业变化、教师队伍实力薄弱等问题^[23]。构建稳定且可持续成长的教师队伍,对于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但是,职业教育现存的问题,客观上对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青年教师怀着过渡的

心态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待时机成熟则以此为跳板另寻出路。从这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仍有待提升。

(二)办学模式创新优化的阻力

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市场化特征,传统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利于高职院校结合自身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并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参与主体创新办学模式的积极性。从现有的办学模式看,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重要的办学模式,混合所有制办学是高职院校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24]。就此而论,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对于职业院校保持市场敏锐度、创新优化内部管理模式、提升办学效率等方面具有实践层面的价值。

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探索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被投资方、政府和职业院校所认可。投资方在办学中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政府也可借助社会力量弥补一部分教育资金的空缺。回归到教育本身,职业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显然,混合所有制的办学模式在管理上面临着更多挑战。如果政府管理过度,可能会造成投资方积极性不足、职业教育创新能力受限等问题;而任凭资本过度参与或无序竞争,则很容易稀释职业教育教书育人的初衷和底色,在客观上给职业教育的办学、教学模式创新形成挑战。近年来,国家鼓励普通教育系统和职业教育系列在学力互通上进行模式创新。但是,现阶段一些学校设置的学习成果认证和转换办法,给职业教育学生转向普通教育系列与普通教育学生转向职业教育系列造成一定障碍和阻力^[25]。

(三)动态评估反馈机制的滞后

要维系职业教育变革的长效动力,必须补齐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短板。在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扶持下,职业教育较之于以往有更丰富的办学资源,但由于评估机制和反馈机制的相对滞后,导致大量的办学资源处于未开发利用的阶段,没有真正形成公平参与、资源有机融合的办学格局。唯学历论的社会评价机制的价值导向机制和表现形式,是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指标^[26]。

除了价值导向方面的偏差之外,职业教育

的评估机制还存在规定含糊或不具体的问题。职业教育教师标准建设的法律法规依据仍不健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27]。从学生的评估体系看,职业院校学生评价主体的单一性,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缺乏内部与外部双重客观性^[28]。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职业院校学生的在校表现含金量大打折扣,以至于部分学生对此重视程度不高,进而造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处于松散的管理序列之中。此外,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本科教学的时间较短,新设立的专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在出台统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考评体系等方面,都还处于摸索和不断

完善的过程之中^[29]。从以上角度看,尽管当前有关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已日趋完善,但由于缺乏对标准执行效果的行政监督机制和有效反馈机制,职业教育标准化治理的效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30]。

五、以协同治理推进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优化路径

职业教育发展现存的困境不仅源于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还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参与模式及评价机制。因此,破局之路需要强调协同,要以职业教育为基点,协同夯实质量变革的物质基础,协同探索效率变革的协作方法,协同优化动力变革的顶层设计(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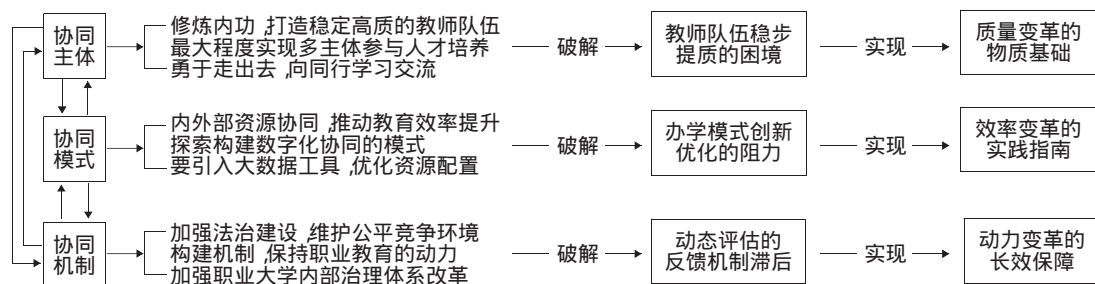


图1 协同治理推进职业教育“三维变革”的优化路径

(一)整合多元协同主体,夯实质量变革的物质基础

实现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需要从内部和外部的主体参与方面进行优化创新,通过务实有效的措施方法,吸引不同领域的主体有序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最终形成职业教育和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循环,奠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

首先,要修炼内功,打造稳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教师是职业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变革的坚实力量。而推动职业教育的质量变革,需要凸显职业院校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包罗万象,各种细分的专业门类都需要强大的师资力量作为支撑。当前,社会层面对职业院校细分领域的认知不足,难以深刻领会不同专业的差异和培养重点。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市场需求也日新月异,时代对职业院校教师、学生的要求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拥有学习进步的机会,不断优化教师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职业院校和相关管理部门

应鼓励教师进行科研交流,着重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与科技素养^[31],通过完善教师的培训体系、职业发展路径,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可结合师资的构成情况,尝试探索校内多导师联合培养、校内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互通培养等模式,实现教师与教师间的融合互动,在交流中不断提升个人水平、增强团队意识和优化工作氛围,从而为教师的长期发展提供稳定、舒适的工作环境。

其次,在教育培养方式上,要最大程度汇聚多元主体的力量,促使用人单位、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家长 and 校外组织等各类主体充分参与、集思广益。多主体的协同参与能够使职业教育获取信息渠道、了解市场需求的基本面进一步拓宽,为职业院校管理层、相关主管部门的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直接帮助。职业院校提供的社会服务,从社会中来也应该回到社会中去,要在教育培养方式的各个环节密切把握时代脉搏。而要使上述目标落到实处,需要多方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计划的设计,以确保职业教育培训能

够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使不同技能水平、不同维度的技能获得更新^[32]。除了外部要素之外,也要特别关注教师这一内在主体。教师能否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教学质量及学生的体验感,对职业教育质量变革具有直接影响,教师参与机制对于职业教育满足面向未来的技能培养需求至关重要^[33]。

最后,职业教育要勇于走出去,通过学习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及彼此间的交流碰撞提升办学水平。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需要不断更新,闭门造车不可能办好职业院校,也无法培养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初衷是为了有效提升自身的水平,既需要坦诚分享自身行之有效的经验,也需要包容并蓄吸收兄弟院校的实践成果。职业院校可通过彼此间的互信合作,以建立区域职业教育联盟、校际职教师资合作队伍等形式,达到深度融合,形成区域竞合的优势^[34]。不同区域的职业院校交流互动,对于全面把握生源情况、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等方面意义重大,有助于优化职业院校的教学方法以及更精准地把握不同学生的个性特征,从而为针对性解决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职业教育要以质量变革为契机,通过共享实习机会、课程互通等方式,打造以职业院校为基点、多主体融合的高质量协同发展之路。

(二)打造数字协同模式,探索效率变革的协作方法

效率变革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一,要以模式创新来促进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扩大和经济效益提升,并通过就业与人才供给,保证这一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职业教育的效率变革要立足于提升教育投入产出比,稳定人才的转化率与就业率,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首先,应利用内外部资源,协同推动教育效率的提升。在这一语境下,效率不只是代表着教学进度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实操本领、科研能力领会和应用效率的提升。从教学效率的提升看,职业教育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对技能学习的期待。

职业院校要从师资团队建设、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等层面出发,强化课程网站与教师培训、课程教学的内在联系,协助教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35]。除了优质的网络课程之外,职业院校也需要对新技能、新工具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密切留意市场上逐步兴起的教学和应用型工具,使学生能够充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需要。例如,院校要有意识地让学生接触和使用 ChatGPT 等先进的信息搜索工具,通过对学生进行新工具应用的培训,不断强化学生的科研和实践能力。在恰当的时机,职业院校也要整合内外部资源,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课题调研等实践,持续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应探索构建数字化协同的模式。职业教育的数字化协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职业院校的校内和校外协同;二是学校管理层与职工的协同;三是教师内部的高效协同。从校内外的协同构建来看,需要以数字化宣传载体为基点,畅通社会主体参与高校治理的渠道,帮助职业院校客观收集和反馈各方意见。从职业院校管理层和职工的协同看,建立起目标一致的协同体系是关键环节,要让每一个成员充分理解高校治理的目标和进展情况,使各参与主体能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灵活调整自身角色,减少组织内耗与管理成本。为使协同模式更为高效,职业院校应重点加强职业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如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的培养培训^[36]。从教师内部的协同看,职业院校要建立起每个教师的数字台账,通过多个教师的不同视角,充分呈现不同学生的特殊情况,从而发挥各门类教师的专业优势,在数字化工具的协助下细化培养方案,并根据实践现状适时调整培养计划和培养进度。

最后,要引入大数据工具协同分析市场,合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职业教育的效率提升最终还是需要回归到市场,并接受市场的检验。这一要求不只针对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层同样适用。对于职业院校的管理层而言,其对内要善用大数据分析,分析和研判每一年的生源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管理方案,对外要有敏锐的

市场意识,建立起动态的岗位需求表、人才缺口表等市场调研体系,通过市场的变化科学调整资源配置和战略方向。教育者应当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支持,提高职业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37]。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教师要善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和了解市场,对各行业的薪资水平与需求缺口情况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从而为学生的职业规划提供必要的指导。职业教育只有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构建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在经济效益、人才转化效率上有更为直接的保障。

(三)强化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动力变革的顶层设计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动力来源。当前,国家产业集群、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需要在机制层面充分契合新的时代环境,通过产教的深度融合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提供动力。在协同治理的视角下,职业教育需要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协同机制,确保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充满竞争力。同时,职业院校也要实现考评机制的公平性和反馈的时效性,进而激发参与主体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

首先,要加强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的环境氛围。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主体参与的热情,但不合理的恶性竞争也加剧了不同职业院校之间的矛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内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领域的法制机制不健全,导致务实办学难得其利,打擦边球或钻法律漏洞却获益颇丰。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办学环境,务必从根源上杜绝投机取巧,应从机制层面鼓励真心办学的集体和个人,将职业教育办学真正打造成一项可以长期奋斗的事业。职业教育首先是教育事业,然后才是社会化的产业。因此,要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及制度供给,以制度规范减少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的阻力将成为未来趋势^[38]。职业教育应通过完善机制,将不同的办学主体纳入适度管理的体系框架之下,立足于同一评判标准,以市场

为评估检验的第一准绳,打破地域保护、超大型教育集团的相对垄断地位,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开放、自主办学。

其次,要通过构建提质增效机制,保持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从发展现状看,相当一部分的职业院校有民营资本的投资。这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符合社会化办学的需要。管理部门在引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帮助职业院校建立起提质增效的机制。这既是新时代职业教育融入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职业教育特色竞争力的重要法门,既是在合法营利机制下激发社会资本办学热情的有效途径,也是吸引市场化管理团队加入职业教育大军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搭建职业院校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强化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完善共治机制、健全德育体系,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的高层次、高端化、高质量发展^[35]。通过社会资本的高效参与,扩充职业教育的物质力量,并借助市场化团队的精细化管理,稳步提升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最后,要加强职业院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这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可回避也必须做好的答卷。从内部的主体分类看,职业院校内部的治理体系改革主要面向学生和教师两个维度。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职业院校既要做好招生工作,也要做好学生的培养成才工作;从招生角度看,职业院校要不断优化内部质量评估及优化机制、外部质量保障及监管机制,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水平,让家长及学生愿意主动分流至职业教育^[39];从教师发展的角度看,职业院校既要让教师劳有所得,也应形成淘汰机制,将责任心差、品行不端等饱受诟病的教师逐出队伍,确保校园氛围的风清气正;从教师考评的角度看,职业院校需要尊重教师的创造力和重视其实际本领。要以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为引领,探索建立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教师考核评价标准^[40]。总体而言,职业教育要通过职业院校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形成重能力、重责任的选才、育才、用才的价值取向,从而真正为热心于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

参考文献：

- [1] 吴萨.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思想纵横):牢牢把握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③[N].人民日报, 2023-05-18(9).
- [2] 张太宇,王燕红.高职院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6): 37-40.
- [3] 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开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新篇章[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31): 10-15.
- [4] 赵降英.培养智慧新农匠:涉农高职院校增强适应性的战略思考与实践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24): 72-78.
- [5] 张海明,高杰,房曰荣.对职业教育服务质量强国战略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 2022(16): 41-45.
- [6] 周文和,尤伟.批判与归正: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审视[J].职教通讯, 2023(6): 34-42.
- [7] 兰金林,石伟平.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成效与经验反思:基于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职业, 2020(20): 32-38.
- [8] 朱德全,徐小容.协同共治与携手共赢: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生成逻辑与推进机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74-83.
- [9] 刘燕.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结构改革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向[J].教育与职业, 2016(13): 11-15.
- [10] 曹叔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时代意蕴、核心要义与现实表征[J].职业技术教育, 2023(9): 7-12.
- [11]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改革与教育资源建设工作手册:上[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 2009.
- [12] 庄西真.质量·效率·动能[J].职教论坛, 2017(31): 1.
- [1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发布[EB/OL].(2022-08-20)[2023-08-02].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20/content_5706220.htm.
- [1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2023-07-07)[2023-08-0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2671.htm.
- [15] 朱成晨,朱德全.以“变”制“变”: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三大逻辑”转向[J].教育与经济, 2018(1): 5-7.
- [16] 张志军,张蕴启,范豫鲁.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J].职业技术教育, 2019(22): 11-16.
- [17] 周益斌,肖纲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生体的发展困境及推进策略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2): 80-87.
- [18] 王超,堵文静,钱江涵.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时代意蕴与逻辑构建[J].教育与职业, 2023(8): 34-40.
- [19] 郭豫,巩有奎,王作鹏.知识生产模式视域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属性、困境与路径分析[J].教育与职业, 2023(9): 71-74.
- [20] 潘海生,杨慧.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能力的形成机理与提升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 2023(2): 52-61.
- [21] 周敏,马早明.政策工具视域下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取向与特征分析[J].教育与职业, 2023(11): 76-83.
- [22] 冯朝军.新时期我国构建职普融通教育体系的策略研究[J].职教发展研究, 2023(2): 93-100.
- [23] 季诚钧,莫晓兰,朱亦翮,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内涵、问题与路径[J].浙江社会科学, 2023(6): 90-97.
- [24] 张江荣.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发展困境及实现路径研究:以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 2023(17): 149-152.
- [25] 李中亮,唐西.新《职业教育法》语境下的职普协调发展研究[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22(5): 11-18.
- [26] 孙东山,台合语.论教育评价的根基、限度及转向[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21(11): 34-38.
- [27] 杨丽.职业教育教师标准建设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 2018(10): 81-87.
- [28] 冯永琴.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学业评价的比较及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0(12): 60-64.
- [29] 王宝智.推动长三角地区职教一体化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 2022(22): 59-61.
- [30] 李政.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化治理:逻辑、困境与出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53-164.
- [31] 张思琪,匡瑛.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新定位、特征与推进策略[J].职教论坛, 2023(5): 5-12.
- [32] 徐国庆,蔡金芳,姜蓓佳,等.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职业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 版) 2023(7) :64- 77.
- [33] 唐林伟.职教教师数字能力发展 国际视野与中国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4) :27- 35.
- [34] 宋杰.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圈层体系构建研究[J].职业技术 2023(7) :34- 39.
- [35] 李凡.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院校课程建设研究[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3(6) :89- 92.
- [36] 周如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及优化策略 :基于 Nvivo12.0 的政策文本分析[J].教育科学论坛 2023(15) :9- 18.
- [37] 杨瑞雪.高职院校人才分层培养模式实践探索 :评《高职院校分类分层人才培养创新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 2023(5) :101.
- [38] 贾旻 南海.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106- 115.
- [39] 石洋 黄勇辉.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 :基于技能社会建设[J].社会科学家 2022(12) :140- 146.
- [40] 雍莉莉.新时代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探析[J].教育与职业 2023(11) :57- 60.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Helps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ath Optimization

Wu Changlin, Zhang Zezhe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Reforms in quality, efficiency and dynamics are important path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bodies new logic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which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is an epitom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difficulties exist in steadi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faculty, innovating and optimizing educational models, and constructing a feedback mechanism for dynamic evalu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ree-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uch as integrating multiple collaborative entities to boost the quality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ing a digital collaboration model to explore ways of efficiency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optimize the top- level design for dynamics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刘振宇 责任校对 刘北芦】